



军旅伦理学文库 2006A

军旅 伦理学新论

翁世平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军旅伦理学文库 2006A

军旅伦理学新论

翁世平 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

序

先进伦理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前驱，也是国家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标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历史大潮汹涌澎湃，呼唤并推拥着在创新中行进的伦理精神。

本书作者身驻军旅，放眼环宇，潜心耕耘于哲学伦理学园地，力图从独特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新世纪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观察与透析，并以学术著述的形式表达别具一格的理性思维。

在这些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中，或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目标伦理道德建设的阐释和论证；或是对新世纪荣辱观、幸福观、公民社会公共伦理生活的辩证与构想；或是对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思想道德建设的人格、信念及价值进行审慎的反思与求索；或是对当代国防军事领域中伦理冲突和行动原则、规范的质询、举证与探寻，无不是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特殊的伦理情怀，对中国以至世界和平发展及人类历史命运予以深切的关注，进行面向未来的思考，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实进程中，显现特有的学术创新价值与实践前瞻意义。

一切与现实同行、与生活同在的哲理、伦理的创新与探索，都有待于人们在更广阔的实践和更久远的时间中加以反复验证和深层开掘，才能在历史检验中不断校正，在生活历练中日臻完善，在社会成就中展现勃勃生机。

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同作者一道分享着成功的喜悦，并借此祝愿学界广大同仁携起手来，共创军旅先进文化与世界和谐文明的未来，去迎接明天美好蓝图的实现！

陈 瑛

2006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第一章 和谐社会德治方略	/1
一、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历史底蕴	/1
二、新时期以德治国方略的时代内涵与创新思维	/12
三、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5
第二章 当代荣辱观念导向	/38
一、和谐文明的战略导向	/38
二、荣誉耻辱的伦理底蕴	/39
三、知荣明耻的时代新意	/41
四、道德建设的良性运转	/42
第三章 小康社会幸福新解	/45
一、幸福观研究及其意义	/46
二、中外幸福观历史考察	/53
三、幸福观现状解析	/59
四、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幸福观	/64
第四章 党的执政伦理建设	/73
一、执政伦理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功能	/73
二、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鲜明特色	/78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现实考验	/91
四、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创新与完善	/97
第五章 公共生活伦理探析	/108
一、公共生活伦理本质及其时代意义	/109
二、我国公共生活伦理建设面临的问题	/115
三、我国公共生活伦理建设的对策	/122
第六章 网络道德共识生成	/133
一、网络交往行为中的人	/134
二、网络伦理视角下的人	/141
三、网络道德共识的确立	/147

第七章 军人道德信念培育	/158
一、军人道德信念的基本内涵与实践意义	/159
二、新时期军人道德信念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172
三、新时期军人道德信念建设的现实任务	/177
四、新时期军人道德信念建设的基本思路和主要途径	/182
第八章 军事人才人格塑造	/192
一、军事人才人格及其构成	/193
二、军事人才人格目标的确立	/201
三、军事人才人格塑造对军校德育的基本要求	/207
第九章 军人道德教育价值	/213
一、军人道德教育价值的概念及形态	/214
二、军人道德教育价值实现的历史进程	/224
三、军人道德教育价值实现的影响因素	/229
四、新时期军人道德教育价值的充分实现	/236
第十章 军事活动环境反思	/248
一、军事活动与环境的关系	/249
二、军事生态灾难的形成及危害	/254
三、军事生态灾难根源反思	/262
四、化解军事生态灾难的环境伦理之路	/269
第十一章 国防伦理实践应用	/274
一、现代国防与国防伦理	/274
二、战略应用:斡旋国际政治大舞台	/275
三、实战应用:驾驭现代高技术战争	/276
四、教育应用:建设国家和军队的精神长城	/278
第十二章 军事伦理创新发展	/280
一、拓展伦理文化视野,学科基础研究独树一帜	/281
二、廓清军事道德诉求,规范体系研究层次分明	/285
三、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应用研究广泛深入	/288
四、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促进学科建设创新发展	/292
主要参考文献	/295
附录:军事伦理德育教学建设简表	/296
跋	/297



第一章

和谐社会德治方略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国家治理,在新世纪实现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和民族伟大复兴,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时代性课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郑重提出将“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我党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完善并丰富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锐意改革,不断开拓,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治国方略的新思路。

系统阐释以德治国方略的科学内涵和哲学依据,努力揭示以德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联系,深入探讨从“以德治国”走向“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从而在实践中全面落实“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历史底蕴

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人类精神的成长史,也是人类道德的进步史,同时也是人本身的德性和人格不断提升、充盈和超越的发展史。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素以“厚德载物”作为民族文化传统深刻的历史底蕴。中华民族的丰厚伦理道德传统,渗透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各个时期,辐射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诸如:做人求诚信,做事讲敬业,撰文须载道,育才尊德性,经商谋义财等等。历代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几乎一以贯之地以儒家德治理念为主脉,看重伦理道德的社会功效,从而构建了根深蒂固而又富有特色的德治理念体系,形成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成员行为方式产生独特而深远影响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直至今日,这一体系仍然

对我国以至世界的政治、经济、伦理和文化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历史轨迹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重要内容之一,是人自身、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和调节方式,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以人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的价值观念、心理活动、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之所以能成为治理国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有其特殊功能,可以通过教育、指导、示范、激励等途径调节社会关系,指导社会整体活动,从而指导个人把社会规范和要求转化为内在信念,并对社会环境适应和改造。道德之所以能成为治国理念、治国方略,就在于它建立的伦理秩序包含着治国者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理想目标。中国古代儒家强调道德修养、道德自律和德治、德政,就是从道德视角对社会生活进行解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崇高性、正当性提供必要的价值思考,以觅求并实施其治国之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①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正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更替、兴亡的历史过程,走出自己兴衰和消长的历史轨迹。它是时代性与传统性的统一,并具有深深的“民族精神的标记”。^②

1. 先秦时期的萌芽与勃兴

周武王灭亡商王朝后,西周统治者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最早提出了“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鉴于商朝后期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固有观念形态不足以适应周人确立治国方略和宗法等级分封制度的现实需要,难以调整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统一广大区域内各族、各部的思想行为,周公着手将分散凌乱的礼仪进行整理、补充和修订,使之典礼化,史称“周公制礼”。周公对“天命靡常,以德配天”进行发挥,提出“敬德保民”的治国主张,并提出“慎用刑罚”,认为刑罚是国家用来维护秩序的手段,如果用刑不当,则将招致民怨,所以,在使用刑罚时应该以善为怀,要设法使民众心悦诚服,就像医治自己的疾病一样对待犯罪者的过错,从而使犯罪的臣民能够改过自新。经过“周公制礼”,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对西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建立和等级分封体制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有关礼的观念与学说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既成为国家施政的原则,也成为“国无失其民,王无失其臣,贵无失其贱,尊无失其卑”的精神纽带。历史雄辩地证明了,当时国家的治乱、社会的兴衰,都与礼的实施有着密切的关系。周公这一思想开中国历史上德治理念的先河,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由此萌发。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生活变化剧烈,群雄并立,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为求富国强兵,各国先后进行变法,对原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②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56页。

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孔子上承三代文化传统,以“仁爱”思想为核心,明确提出德治主张,在治国方略上提出了“为政以德”,成为中国古代德治理念体系集成的先驱。针对法家重刑轻德的理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①意思是说,治国如果不重视道德教化,一味地依靠政令和刑罚的强制手段,靠强力来制服那些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可能产生“羞耻之心”,也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就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甚至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从而陷入邪恶的深渊。孔子培养的大批弟子中,有思想建树的有70余人。其思想体系经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发展,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初期意识形态的主流,特别是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严酷考验,其德治理念非但没有灭绝,反而影响日盛。

2. 两汉时期的独尊与神化

随着秦统一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封建的自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确立需要统一的治国理念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儒家的德治理念逢迎其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汉代统治者经过反复权衡,辨别利弊,终于在董仲舒的大力策动下,由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儒家德治理念从此由私学跃升为官学,由一派之学跃升为统治之学,取得“独尊”之位,实现地位与作用的重大历史性转折。经董仲舒的改造、推进,儒家德治理念走向官方化、神学化和经学化,并因此盛行两汉,经魏晋和唐代的变异、演化,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为了适应巩固君权的需要,儒家德治理念一度同谶纬神学合流。董仲舒大力鼓吹“天人感应”的宿命论思想,把儒家德治理念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之趋于神学化。董仲舒根据他的神学人性论,建立起“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通过封建统治者在全社会推行,使人们的行为目标具体化、规范化、一致化。这一体系的形成,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宋明时期的复兴与僵化

宋代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后期,成熟与衰落并进。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治国理念,在理论形态上更加精致化。其完备而成熟的理论形式主要以“程朱理学”出现,即:“二程(程颢、程颐)奠定基础,朱熹集其大成”。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与理学对立争锋的“心学”和“实学”,一时竞现繁荣。“程朱理学”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形式的更加精致、完备,把中国儒家德治理念本体化、宇宙化,称之为独立于社会和人类之间的“天理”,正如朱熹所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程朱理学”系统地提出了禁欲主义,即“存天理,灭人欲”,并全面演化为社会生活领域复杂、细密的道德规范,如守妇节要做贞烈女,为臣要对君愚忠等,使德治理念深深积淀在民众的心理中,外化于生活言行中,以道德规范的强烈影响,为强化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服务,在钳制和束缚人们的思想方面,显现其愈来愈坏的作用。

^① 《论语·为政》

4. 近代以来的失势与退化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危机。清代统治者强化专制统治,一方面大兴文字狱,焚毁一切有碍“治道”的图书,一方面大兴科举,诱使知识分子钻入故纸堆,从而考据学大兴,儒家德治理念畸变为清代经学。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加速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在意识形态领域把矛头直指儒家学说。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儒家的德治理念体系开展无情批判,揭露其为封建君主独裁统治服务的本质。他们着重揭露“三纲五常”是“愚民之术”,蒙蔽人的理智,禁锢人的思想,认为“三纲六纪,无益于民德秋毫”,它压制个性,实质上是“以理杀人”,只能使中国成为惨无人道的地狱。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封建制度的衰败没落,儒家德治理念成为近代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从以往至尊宝座上跌落失势,在新时代的洪流中日趋退化与衰微。

上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演化过程表明,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认为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尤其是使统治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和王朝的兴衰;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更值得借助的力量,是设立各种社会制度、措施的内在依据。从这个基点出发,儒家重义轻利,以“仁”为道德的最高原则,提出了日趋细密的“德治”理念,并据此建立起各个社会生活层面的道德规范体系。显然,中国古代儒家的所谓德治,主要是指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全面的社会教化及施惠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治国之道。

(二) 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主要内容

从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看,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盛衰演化与中国社会的治乱兴替如影随形,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和道德传统水乳交融,并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以科学的态度对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加以分析、批判与继承,可以将其主要内容梳理出以下几个方面:

1. 协和万邦:追求“大一统”的治国目标

儒家德治理念追求“协和万邦”的治理目标,崇尚“大一统”治国模式。早在《尚书·尧典》称赞帝尧的功德时,就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的记载,表明中国古代十分崇尚一种人性善良、道德淳朴、万邦协和、国泰民安的文明社会。

夏、商、周三代的王权政治,实行所谓“封建制”,即采取分封诸侯的方法,众建邦国,以屏藩王室。经过春秋、战国以后,分封诸侯的弊端充分暴露,“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成为巩固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首要前提。自三代伊始,统治者就逐步建立并完善了血缘宗法制度。秦王朝统一六国之后,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行所谓的“郡县制”,开创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汉承秦制”,大一统的治国模式终于确立。

与之相应,中国古代在宗法制基础上发展出一种人伦型群体网络结构,笼罩于全社会之上。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下,逐步建立了一套文官制度,辅之以科举选拔官吏的选举

制度,形成庞大的官僚体制,配以独特而又完善的礼乐、刑政制度,以确保官僚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尽管发生多次“易姓革命”的王朝嬗递,新王朝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①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国家出现雏形,封建专制的“大一统”让位于新型的统一国家。

2. 政德定国:强调统治阶层道德品行修养

儒家德治理念首先强调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中国封建社会里君权是权力的核心,君主是权力的象征,儒家正是基于君主在封建等级序列中的地位,认为德治应首先强调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儒家认为是否有“德”,应由是否遵从宗法等级、亲亲尊尊而定。反映在国家的政治运作中,尚贤“因为其反映了尊崇居人伦主导地位 and 道德榜样的伦理政治精神,而成为一种基本的合德性行为与规范。”^②

儒家德治理念认为,君主的道德是否高尚,形象是否完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君主不仅要有超众的才能和智慧,而且首先要有良好的道德和品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③在社会生活中,统治者对一般民众有着典型的表率作用,其一言一行都会对社会成员产生重大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君主的行为对民众起到表率感化的作用,就能够得到民众的真心拥护。最高统治者德高身正是政令通行、政治稳定的根本。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⑤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因而,要向君主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

董仲舒则认为自然、社会及二者之间高度和谐的理想图景都基于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汉代贾谊认为:“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认为君主的道德品质对于全社会具有价值导向作用,良好的君德能够带出良好的官风、政风、民风。程颐认为,社会治乱取决于君主个人品质的好坏,其他因素都是次要的。朱熹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基础,这就是君主的德行。统治者包括最高统治者国君和大小官吏,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

如何才能实现君主的德高身正呢?儒家德治理念认为道德修养是唯一的途径。对于社会的统治者来说,修身与治国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修身是实行德治的前提条件。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在道德方面进行修养;一个自身道德素质不高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真正推行德治。另一方面,德治也是修身的必要条件。国家治理的好,正义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德之人才能在社会中行得通。孔子在“克己复礼”、“仁者爱人”的思想前提下,提出“天生德于予”的命题。孟子亦认为修身养性是实现“仁政”的至关重要的内在因素,对此,孟子从存心、养心、尽心等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修养方法。认为存有善心,通过“寡欲”和“养浩然之气”,最终使人的善心达到完美的状态。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

② 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③ 《论语·为政》

④ 《荀子·性恶》

⑤ 《孟子·梁惠王上》

成于秦汉之际的儒家经典《大学》集中论述了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把格物致知理解为道德修养，朱熹说道德格物致知就是“穷尽理性”。王守仁则更加明确的指出，所谓“致知”就是“致良知”，即把主体自身固有的良知发露出来，通过自身修养，以“兼善天下”。儒家提出修养是做人的基础，也是实现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的前提，只有经过修身齐家的伦理实践，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

儒家认为，君主要实行“仁政”，除了自觉修养德行外，还要有“选贤”制度作为外在的监督来保证仁政的施行。孔子明确主张使用德行高尚的人；孟子提倡“用上敬下”的尊贤方式，形成儒家“任人唯贤”的政治道德观念；荀子认为，君主应当任用德才兼备的贤人，成就霸业；朱熹认为，任用贤能之人为政是实现德政的重要一环。儒家从德政出发，把“尊贤惜才”视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为心，尊重人才，以德才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大胆提拔人才，使用人才，信任人才，积极鼓励贤才发挥自身才智，以定国安邦。

3. 以民为本：主张调和君民关系安民保国

仁者爱人是贯穿于儒家德治理念的基本观点。“仁”首先是“爱人”。孔子说：“爱众而亲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次，是“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的思想，是把修身作为修齐治平的起点，又把修齐治平作为修身的归宿。反映在治国理念上，“仁”学除了体现在“君德”上，还体现在重民精神上。君主为政以德的精神实质，实际上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以德治、仁政去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自觉拥戴。道德感召要能够发挥作用，必须以广大民众为根基。

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民本思想的基本框架。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积极倡导民本思想，对以后的治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以后的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儒学教民、富民的思想，并使之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明清之际，以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思中国传统的弊病，继承和发扬前代的民本思想，将民本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民本思想在德治理念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德治理念的核心，主要内容有：

民为邦本——百姓是国家的唯一根本和基础，基础牢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尚书》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论为政之道，把“爱人”放在为政之首。对此孟子认为“以仁政之所以可以平治天下”，究其原因在于“得民心”。孟子认为只有施仁政于民，才能得民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孟子提出著名的“民贵君轻”的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强调民为邦本，邦为君本。贾谊曾对孟子的这一思想做过详细论述和发挥，贾谊把民众作为国家、君主和官吏的根本，他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故因是国也而为安，因是民也而为治。”意思是说政治制度可以更换，从事政治管理的官吏也可以更换，但国家和民众却是不能更换的，统治者必须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的命运都

掌握在民众手里,国家能否存在,君主是否贤明,官吏是否称职都要通过观察民众来判断。民众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力量,战争的胜负,政治斗争的输赢,都是民众力量的反映。也就是说,民心的向背是政治成败的决定因素,是事业成功与否的决定力量。荀子把君与民的关系概括为舟与水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又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意思是说,君主的存亡、强弱一切取决于民众的支持程度。《尚书·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民众的行为反映了天意。这个天意是历史发展的大势,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观念,表明了儒家对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的高度重视。因此,儒家强调统治者应促民心之所向,弃民心之所背。孟子说:“桀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统治者政权的巩固或崩溃,取决于民众的拥戴或反对。孟子论君道,强调“保民而王”,“为民父母”,“与民同乐”;论治国,强调“民事不可缓也”,认为如果轻视残害民众,王道仁政就荡然无存。荀子指出:“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说明统治者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做到兵强国安。

惠民利民——治国为民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民众得到利益,“民为邦本”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就是推行仁政,惠民利民。也就是减轻对百姓的压迫,使他们的物质生活有所保障。儒家学者很重视保障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甚至认为这是比道德教化更优先的事情。

孔子提倡德治,反对苛政、暴政,主张以仁德施惠于民众。孔子在讲到治国之道时,要求统治者的政策主动顺应民众追求利益的欲望,让民众得到实际利益。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他主张体恤百姓疾苦,轻徭役,薄赋敛。在孔子看来,重民食是“养民也惠”的根本,“富民”才是更高的追求。要想真正富民,必须“养民”、“惠民”、“安民”,“使民以时”,使民无违农时,安心生产。当子张问孔子怎样从政时,孔子要他“尊五美,屏四恶”,即反对苛暴之政,主张仁民,惠民,博施于民。

孟子把孔子的惠民思想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的仁政学说。一方面,应“制民之产”,重视发展生产,使民丰衣足食,保证百姓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富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①另一方面,要“取于民有制”,省刑罚,薄税敛,以仁心行仁政。同时,要关心百姓疾苦,与民同乐。“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事,所以富之也。”

荀子认为惠民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两汉儒家学者认为统治者要根据老百姓的要求

① 《孟子·梁惠王》

② 同上。

和实际可能,使他们得到能够得到的利益。他们认为富民应该重视农业生产。提出要鼓励发展农业,限制商业,使农民安心于农业生产,极力反对把土地大量集中在富豪权贵手中,使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君主只有得民、利民之后,才可能保持国泰民安。

其后的理学诸子也从君主必须行仁政出发,论证和提倡民本思想。程颢说:“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谷,民所赖而生者也;树之君,使修举其所赖而养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节;上焉天顺之,下焉民乐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统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他把仁民爱民提升到天地万物的道德本原地位,力图从更抽象的层次寻求仁政的理论基础,为其合理性做出更加深刻的说明。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进一步提出了轻徭薄赋,重教轻刑,义利统一和朴素的平均观,提倡应该土地“均天下”。他还提出应该宽以养民和严以治吏,并且要把养民建立在仁义和功利相统一的基础上。王夫之不仅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批判了传统“家天下”的尊君观念,反对君主专制。

4. 德教为先:推行教化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儒家强调德育教化作为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善于“教化”才能取得民心,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学记》云:“建国吾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得民心”。这里的“教学”、“学”、“教”都是教化的意思,《大学》则进一步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把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通过系统的言传身教,特别是通过各种学校的教育,转换成人们的内心信念和道德良心,使人们能够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儒家的德教为先的思想,以其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传统儒家关注人性问题,是为了给“德教为先”的学说建构一个理论平台。

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人人都是可教的。之后思孟一派强调并发挥了孔子的“性相近”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的人性学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强调人有仁、义、礼、智“四端”,认为恶是后天环境造成的,提出要保存并发扬固有的善端,就必须通过道德教化。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①同时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肯定人有向善的可能。荀子一派则注重和发挥了孔子的“习相远”的思想,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荀子性恶论突出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突出了教育的作用。荀子讲人性本恶,力倡“善者伪也”,即人的道德行为皆是后天教化出来的,是“人为”的。“今之人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②教育可以教人以礼法,熏陶人的性情,克服人性中的恶,使人为善。因为人性恶,所以必须通过教化使人向善。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谓也?……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②通过教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像大禹那样的人。春秋战国之后,儒家人性论思想的

① 《孟子·梁惠王下》

② 《荀子·性恶》

演变一直是围绕如何调和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之间的矛盾,解决对人们加强封建道德教化的必要性问题而展开的。

儒学思想家重视道德教化,提倡“以教兴国”,凸显了道德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儒家学者认为人的后天素质可以通过教育来塑造。孟子从人性论和德教思想出发,得出了“得民心”、“行仁政”的结论,把道德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董仲舒视教育为政治的根本基础,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①他把道德教育看成是为治国服务的。儒家认为,教化为政治的第一要务,在各种调控措施中,必须坚持教化优先的原则。

对于德教的内容,儒家在继承和发展周以前人伦思想和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和建立了适合中国宗法等级制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人伦思想和人伦规范。通过内外双修,通过修身和礼教,即从内“修身养性”,从外德礼并重,各依其名,各守其分,达到社会有序,民风淳朴。孔子强调四教:“文、行、忠、信”,他还这样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孟子则进一步明确强调“教以人伦”,即所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荀子的德教范围更宽泛,他认为要“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秩序。儒家还建立了自身独特的教育方法体系,提倡“学思并重”、“慎言力行”、“慎独”等方法,通过“外在的教化”以达到“内在的修养”,即通过施教者的言传身教、社会环境的习染,使被教育者接受既定的道德规范。

5. 德主刑辅:采用刚柔并施、宽猛相济的制御之道

儒家崇尚并采用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制御之道。先秦儒家基于社会现实,力图寻找一条平治天下的道路。孔子认为,既要有道德教化的“宽”,又要有刑罚强制手段的“猛”。《左传》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统治者一方面应以道德引导、感化民众积极向善,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必须以法律制裁、矫正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孟子提出“善”与“法”必须相互配合。

荀子在继承孔子的礼的思想的基础上,融入了法的思想,开启儒法两家合流之端,荀子主张在尊德、隆礼的基础上重法。法是根据礼制定的,以礼为指导原则。他建构了一个德刑关系框架。

汉初的思想家看来,秦亡的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道德的重要作用。贾谊在礼制的名义下倡导德治、德教。他认为,道德教化能够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选择的能力,从而不再犯罪。因此,道德教育和感化的目的,就是要“以德去刑”。董仲舒进一步强调了德治的重大价值,提出了“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政治伦理结论,这个结论成为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理论基石。董仲舒在形而上学论证中吸取了道家、阴阳家的五行学说,并将其形而上学论证进一步运用到治国和法治

^① 《春秋繁露》

^② 《论语·为政》

领域。先秦儒学重礼轻刑的思想,被明确的发展为“德主刑辅”。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许多学者从礼法即天理、德刑致中和的观点出发,主张把“为政以德”和“为政以刑”结合起来。朱熹论述道:“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①他强调德主法辅,德本法末,并认为德作为治之本,也是法之本,面对现实肯定刑政的作用,认为有道德的刑政也是“道德之术”。程颐亦持相同的看法,“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谓,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居先。”^②他认为刑罚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活动。理学家主张严刑,但是反对滥刑,义理是他们心中最高的政治价值。其以仁政德治为核心,以明谨刑政为手段,将“德”与“刑”有机统一起来,使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 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实践和儒家德治理念传统,以其基本不变的封建专制政治形式,管理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达几千年之久。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治国实践和道德建设不可逾越的历史积淀。我们在没有历经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科学的治国理念,必须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考察和分析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

1. 统摄性和包容性:促进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

以数千年中华文化为背景的儒家德治理念传统,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实践,均表现其不同的历史局限性,其时代内涵与当今文明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治理国家的历史长河中,均是积淀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人们追求社会发展进步的智慧结晶,具有其重要的历史的价值。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评说中国古代:“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备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二千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十九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③

在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中,蕴涵大量人类共享的思想精华和文明智慧,集中表现为很强的统摄性和包容性,使不同的民族、部落和宗教融汇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在专制主义的大背景下在相当程度上实行了“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对治理国家

^①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7页。

^② 程颐、程颢:《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③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产生了极其独特的效果,使国家制度和社会发展获得强有力的内在支撑;强调以德治吏,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考察民心,注重民意,这种德治理论和实践的推行,对封建统治者具有约束和警醒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恶性发展,从而在封建制度所能允许的限度上满足了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上的和谐,又对中华民族注重道德理想、形成礼仪之邦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外,还有丰富多样的经世济民和为官执政的文明和智慧,等等。我们应以客观公正、批判吸收的态度加以借鉴,从中获取中国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历史资源和有益启迪。

2. 民本性与亲和性:调节社会生活与人伦关系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中的民本思想,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的基础之上,植根于人伦关系和家国同构的土壤之中,形成其特有的民本性和亲和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有效调节社会生活与人伦关系的特点,形成了敬老爱幼、兄友弟恭、夫和妇顺、邻里友善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传统家庭美德,而且孕育了中华民族和协万邦、贵和中庸、亲仁善邻、讲信修睦、怀柔礼让的宽广胸怀和民族美德,显得深沉有力,潜力不可低估,从中可以发掘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内容。同时,这种民本性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并强调了民众地位的重要性,主张接受历史教训,为安定社会、发展生产、拯救时弊提出措施,适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在历史上曾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其富国足民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因素。然而,这种民本性和亲和性对社会生活和人伦关系的调节,从本质上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的,“移孝作忠”,“亲贵和一”,是将国家和血缘关系作为人伦关系的纽带,在国家的机体中建立多层次的人伦关系,以君主为人伦关系的主宰,君臣、君民以至家族关系均以君主为中心,民众是人伦关系的基础,其出发点着重于如何治民、驭民,又表现出对社会发展的很强的阻碍和束缚作用,深深地积淀下了自身不可超越的局限。

3. 虚伪性与矛盾性:阻碍独立人格的发育形成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是统治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思想、价值观念和治政、治国经验等的总积淀,形成中国儒家的为官治政理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构造人际伦常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中国传统德治文明的思想基础。伦理纲常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既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又以政治手段的形式为君主专制制度服务。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一直实行的是君主专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在本质上是以维护王权为核心的文明传统。这一文明形态适应封建宗法政治关系,顺应君主专制政治,尽管表现出来的是“以德善政”的温柔面孔,其实质只是一种以伦理——以政治为取向、以维护封建专制王权为目的的“人治”。儒家德治理念指导下的古代德治,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德治往往依附于人治,从而强化了中国社会封建专制和独裁的特征;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重“民”,但“民”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是被动的受治者。以至于“隆君”而湮灭了个人,导致个人自主性的丧失;中国古代德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成为封建愚民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德治理论和实践的上述局限性,根本上则是由于遭到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扭曲所造成的,同时也是统治阶

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矛盾不可调和的真实反映。

以崇德为本位的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对社会民众的人格塑造形成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堪称一把“双刃剑”。如和贵中庸、忠君爱国、祖先崇拜、重义轻利、包容和谐等内容始终是良莠并存。其中,积极的因素影响和促进了社会民众优秀人格的生存发展,而消极颓废的因素则导致社会民众扭曲人格的生长衍化。今天,我们必须深刻全面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对社会民众人格发展的双重影响,兴利除弊,塑造社会民众健全、进步的现代人格,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以崭新的时代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 封闭性与保守性:导致中华民族的屈辱苦难

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理念主要是一种顺应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文化体系,它在于适应封建宗法关系的现实,维护君主专制政治统治,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缺乏创新性和开放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凝固于封建等级关系这个模式中,缺少政治民主的价值理念,也就谈不上民主建设的制度化、程序化、法规化,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根本区别。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顺应君主专制政治统治而建立的治国理念和传统文化,正是中国在近代开始落后的根源。“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①这又集中表现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不仅丧失其进步性,而且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各种苦难:战争、饥荒、亡国奴的身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当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继续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批判传统中保守、僵化的专制政治模式,肃清其在观念上和文化上的余流,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任务。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清理、批判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专制主义本质,又要注意深刻理解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的独特之处,通过学习中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古代儒家德治理念和实践加以批判继承,无疑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以德治国”方略必须具备的正确思想前提。

二、新时期以德治国方略的时代内涵与创新思维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党面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现实的实践需要出发,对历史传统中的德治理念实现历史性转换,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以核心内容的方式把以德治国及时地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指明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和根本方法,为新世纪中国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确立了战略方针和长远规划。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